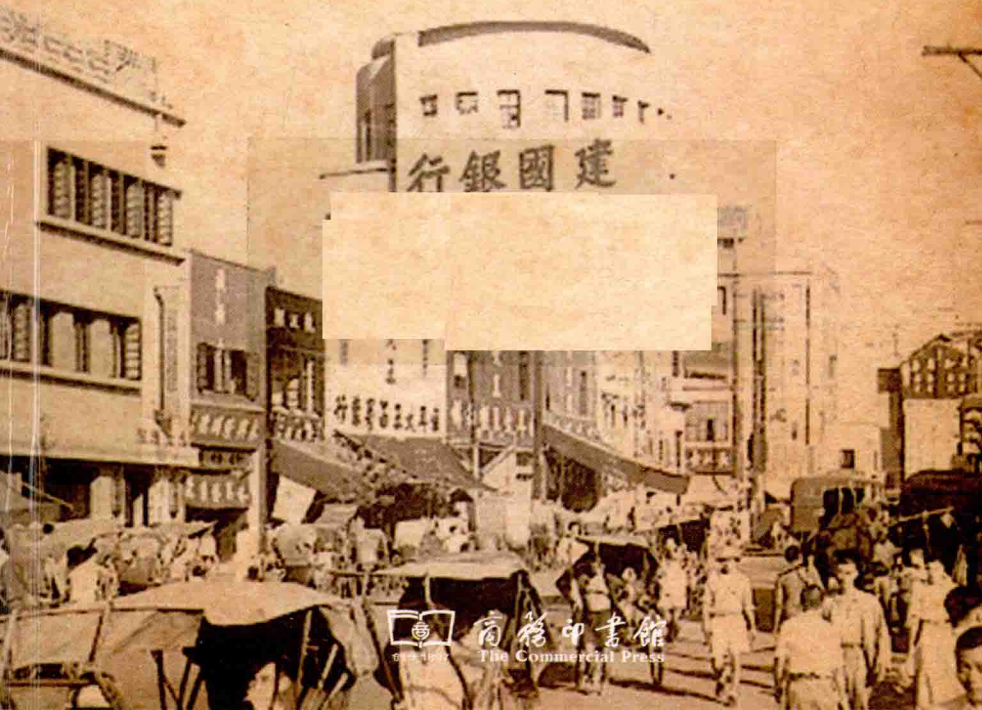


伏线千里

抗战时期金融机构大迁移

王红曼 著

从抗战的宏观视角，详细梳理和介绍了在国家命运岌岌可危之际，银行、保险、证券、印钞等各金融机构，如何实现地理空间上的大转移；以及国家经济命脉如何抵御敌伪之金融破坏，筹措战费，稳定市场，直至取得抗战胜利。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伏线千里

抗战时期金融机构大迁移

王红曼 著



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伏线千里:抗战时期金融机构大迁移/王红曼著.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抗战大迁移丛书)
ISBN 978-7-100-11333-5

I.①伏… II.①王… III.①金融机构—史料—
中国—1937~1945 IV.①F832.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27338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伏线千里
抗战时期金融机构大迁移
王红曼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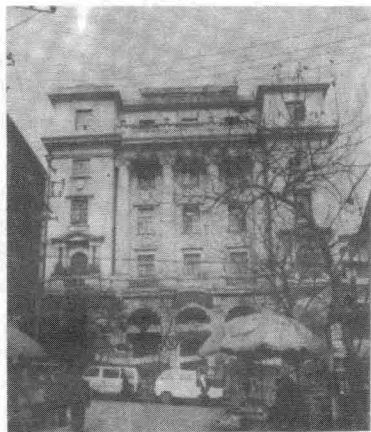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11333-5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5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5 5/8

定价:49.00 元



重庆新华路，中国银行总行旧址。



重庆打铜街，交通银行总行旧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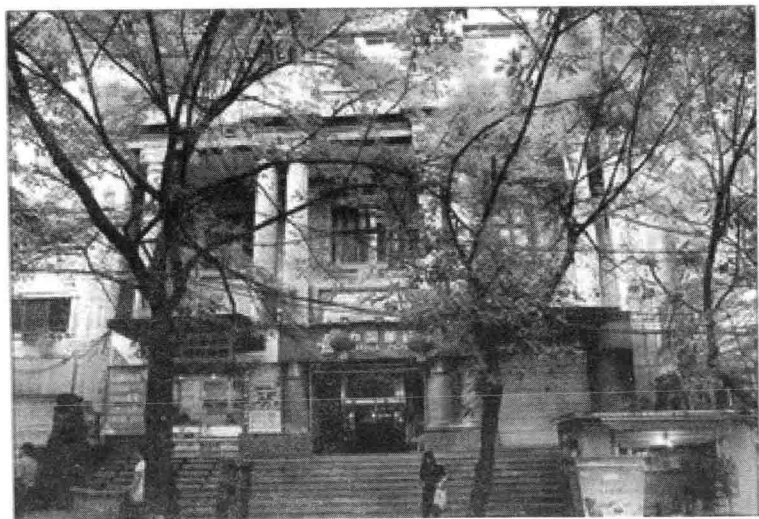
今天，位于渝中区打铜街14号的交通银行旧址依然气派。



抗战时期，交通银行办事处营业部旧址（今重庆李子坝公园遗址）。



中国银行货币发行处旧址。



抗战时期,川康平民商业银行旧址。



重庆道门口，中央银行总行旧址。



抗战时期，重庆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此图是位于陕西街的建国银行。

(MC27834-S)

電

中國銀行重慶分行電匯申請書

中華民國 36 年 1 月 13 日 匯往地點 泰西

收款人	黃學秀	匯款金額	1000.00
住址	西安北大街通濟中街 老保安司令部總務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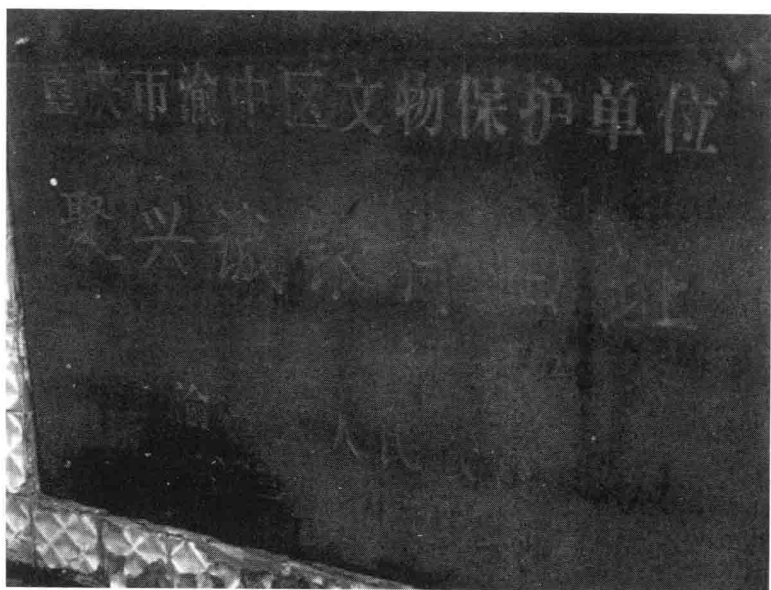
匯款人 李青大 住址 和平路美華商號

電話號碼

電文 西安北大街通濟中街老保安司令部總務處
黃學秀 申 票 為 憑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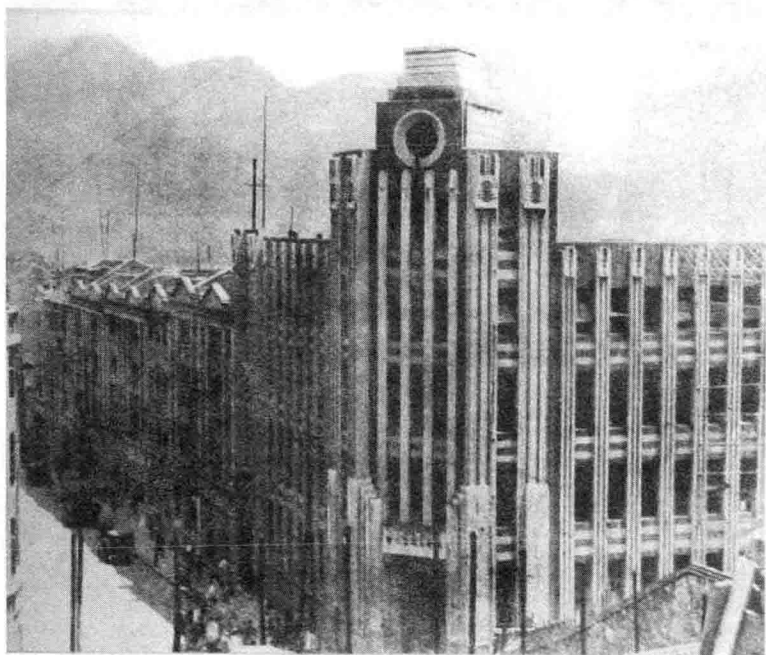
抗战时期，中国银行重庆分行电汇申请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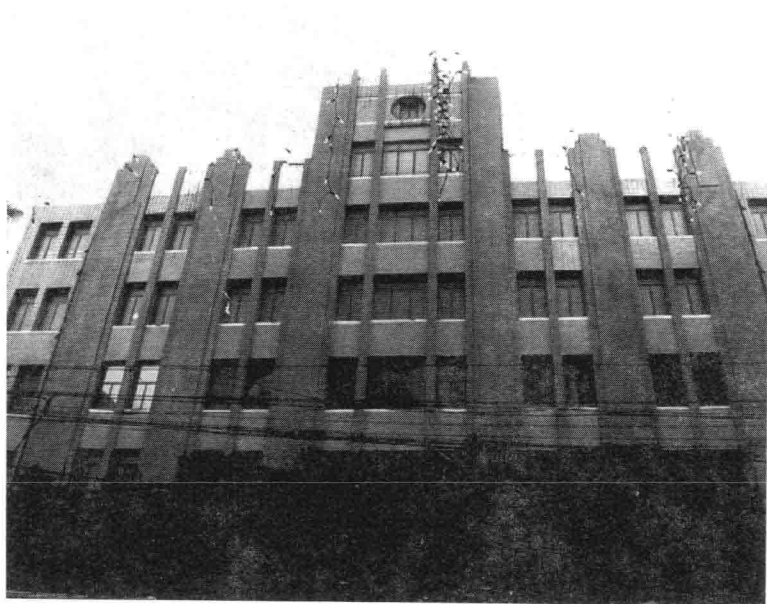
抗战时期，聚兴诚银行旧址（今重庆市解放东路112号）。



1941 年遭受日本飞机轰炸后的中国银行兰州支行办公大楼。



抗战时期，重庆银行同业公会旧址。



抗战时期，美丰银行旧址（今重庆市渝中区新华路）。



抗战期间，天津中国银行旧址。



伪满洲中央银行奉天分行。

总 序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前夕，商务印书馆推出了“抗战大迁移”丛书，共五本：唐润明《衣冠西渡——抗战时期政府机构大迁移》，张守广《筚路蓝缕——抗战时期厂矿企业大迁移》，孟国祥《烽火薪传——抗战时期文化机构大迁移》，王红曼《伏线千里——抗战时期金融机构大迁移》，常云平、刘力《乱世飘蓬——抗战时期难民大迁移》。

南宋以降，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逐渐向东南转移，民国建立，孙中山、蒋介石先后定都南京，政治中心也自北京转到南方。东南一带濒海，有与海外交通、习染欧风美雨之利，繁荣富庶，人丁丛衍。然而，利弊相生，东南一带地势平坦，不是能攻易守之地。近代和古代不同，古代中国的外敌大多来自北方，而近代中国的外敌则大都来自海上。这样，东南地区地理上的优势便转化为军事上的劣势，一旦外敌入侵，作为经济中心的上海和政治中心的南京等地便立即暴露于敌人的炮口之下。南京，一向以龙盘虎踞著称，但早在民国初年，孙中山就判定，中日之间必有一战，南京不是可战之地。1931 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于次年 1 月进攻上海闸北，发生一·二八淞沪抗战。当时，蒋介石就曾考虑“迁移政府，与倭长期作战”问题，认为“政府倘不迁移，则随时遭受威胁，将来必作城下之盟”。两天后，国民政府暂移洛阳办公。1932 年 3 月 1 日，国民党在洛阳召开四届二中全会，决定以

西安为西京，洛阳为行都。洛阳虽处于中国中心，但属于四战之地，无险可守，并不能成为理想的战时首都。12月1日，国民政府迁回南京。

迁都，只是政治中心、军事中心的转移。1934年1月，国民党召开四届四中全会，蒋介石向会议提出《确立今后物质建设根本方案》，其中提出：国家及私人大工业今后避免集中于海口；道路、航路之开辟，尤须首先完成西向之干线，使吾国于海口外，尚有不受海上敌国封锁之出入口；于经济中心区附近不受外国兵力威胁之地区，确立国防军事中心地。这一方案的提出，表明当时国民党领导人在设计经济建设计划时，已经考虑到对日作战的需要，并且考虑到向西部发展的问题。因此，蒋介石在为自己规定当年任务时，即列入“专心建设西南”一项。1935年2月，他在庐山规划国防工业方案，电令赶筑西南各省公路。同年3月，蒋介石在重庆演讲，明确提出“四川应为复兴民族之根据地”。他特别致电孔祥熙，告以“我方军事与政治中心全在四川”。1936年6月，蒋介石对来华的英国经济学家李滋·罗斯表示：“当战争来临时，我将在沿海地区做可能的最强烈的抵抗，然后逐步向内陆撤退，继续抵抗。最后，我们将在西部某省，可能是四川，维持一个自由中国，以待英美的参战，共同抵抗侵略者。”这一谈话表明，在蒋介石心中，其抗日计划已经非常明晰。同年9月，陈济棠、李宗仁等发动的两广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认为“集中对倭”的条件已经成熟。当时，中日之间的“调整国交”谈判陷入僵局，日本态度强硬，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蒋介石指示冯玉祥、程潜、朱培德等人拟具抗战方案，首先进攻上海日军，指示孔祥熙将上海的现银、钞票等迅速转移到南昌等地，指示在南京的中央政府各部门做迁移准备。这就表明，差不多在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前一年，国民党、国民政

府已经有了迁移的准备和计划。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继之以淞沪抗战。日军以28万人之众，动用军舰三十余艘，飞机五百余架，坦克三百余辆，大举进犯。中国军队以落后的武器和血肉之躯英勇抵抗，血战三个月。11月12日，上海沦陷。11月16日，国防最高会议决定迁都重庆。当晚，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乘舰西上，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等五院随迁。20日，国民政府发表迁都宣言，谴责日军“分兵西进，逼我首都，察其用意，无非欲挟其暴力，要我为城下之盟”。《宣言》表示：“此为最后关头，为国家生命计，为民族人格计，为国际信义与世界和平计，皆已无屈服之余地，凡有血气，无不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本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在此前后，各政府机关、工矿企业、金融机构、文化团体响应国家号召，前所未有地紧张动员，争分夺秒，纷纷西迁，数以百万计的民众不甘于受日寇的欺压、蹂躏，扶老挈幼，千里跋涉，倾室流亡，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未有的大迁移、大搬家。这一迁移，动员之广泛，规模之宏大，过程之艰辛，民族意志之刚毅，人民爱国热情之昂扬，都是中国历史，甚至是世界历史所少见，或仅见的。它突出地表现了中华民族临危不惊，履险不畏，在艰难条件下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可歌可泣，可记可录，值得中华民族子孙后代永远铭记，作为驱动民族振兴的永恒的精神财富。

多年来，当年的参与者和有心人为保留、记录这段历史做了不少工作，留下了不少资料，但是，研究和叙述这一段历史的著作还寥若晨星，许多通史性的著作对此或语焉不详，或草率带过。现在唐润明、

孟国祥等先生的这五本书，以丰富的资料，全面、深入、翔实地叙述了抗战时期，自政府机关、工矿企业、金融机构、文化教育团体以至广大民众的迁移史、流亡史，评述了这一迁移在粉碎日寇速战速决阴谋，保存和发展抗战实力，建设西南后方，夺取最后胜利等方面的重大意义，这就填补了抗日战争史的一段重要空白，是民国史、抗日战争史研究的深入和拓展，值得庆贺。

杨天石

2015年5月写于北京东城之书满为患斋

前言

日本自幕府时代末就开始注意收集中国的贸易情报^①。明治维新时期，全面移植西方制度与技术，并确立了“贸易立国”的发展方针，国力日渐增强。19世纪末，日本加入西方列强，成为清末时期侵略中国的主要国家之一，于1894年发动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由此获得的中国巨额战争赔款，给日本近代经济注入了充足的资金^②。此后，日本对外扩张的野心不断膨胀，于1931年9月18日发动侵占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并不断将侵略目标扩大。1937年7月7日日本悍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七七”卢沟桥^③事变，目的是“三个月内灭亡中国”，进而迅速占领整

① 王力：《政府情报与近代日本对华经济扩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24—27页。

② 甲午战争后，中国屈辱地签订了《马关条约》，条约规定：清政府向日本赔偿2.3亿两白银，折合英镑38 082 884镑5先令6便士半（日本政府要求中国用英镑支付战争赔款）。日本正是依靠这些钱财，大力发展其教育，国民素质迅速提高；在货币制度上才实现了“金本位”，从而迅速步入现代化国家的行列。通过战争繁荣自己——“取之无道”。但更为可悲的是它培养了日本军阀的贪婪，等待中国人民的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和1937年的“七七”事变。参见戴建兵：《金钱与战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2页。

③ 卢沟桥，亦称芦沟桥、永定桥，位于北京市丰台区永定河上，距离北京市中心约15公里。该桥因跨越卢沟河（今永定河）而得名。

个亚洲。日本的侵略野心昭然若揭！一场光明与黑暗的生死搏斗在中日之间全面展开。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特别是“八一三”淞沪会战之后，战火不断蔓延，南京不时受到日军空袭，国家命运岌岌可危，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华北、华东、华中各类企业、机关、学校、组织亦随国府西迁而纷纷内移。其中，金融机构作为国家经济的重要命脉，是国家高等机密和重点保护对象，也在国民政府财政部的安排下，汇入大迁移的洪流之中。本书依据大量档案史料及相关文献，重新再现这一重要的历史事件。

在国内，目前直接或间接涉及抗战时期金融机构大迁移的学术成果主要有四类：

（1）寿进文、邹宗伊、洪葭管、叶世昌、潘连贵、吴景平、朱荫贵等学者分别以战时银行业、战时金融管制，以及中国近代金融市场发展、金融中心转移、金融制度变迁为专题研究，涉及战时金融机构迁移的背景和结果。^①

（2）周天豹、凌承学、青长蓉、刘志英、张朝晖、靳希勤、张天政、周勇、刘楨贵等学者则分别从西南地区金融业、大后方金融网、重庆金融中心、西南工农业贷款、西北农贷及宁夏开发等角度，详细考察

① 主要有：寿进文：《战时中国的银行业》，[出版社不详]，1944年；邹宗伊：《中国战时金融管制》，财政评论社，1942年；洪葭管：《中国金融史》，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洪葭管：《20世纪的上海金融》，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叶世昌、潘连贵：《中国古近代金融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吴景平：《上海金融业与国民政府关系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吴景平：《近代中国金融中心的区域变迁》，《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朱荫贵：《近代中国：金融与证券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